

主 编 褚钰泉 一 本 关 于 书 的 书 阅 读 趣 味 尽 在 其 中

政治运动中的事理与人脉

记吴小如先生

鸿爪掠影

『文革』中的小闹剧

文化一词的复数化

信息时代的俊杰

纳博科夫的启示

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的

中国的有钱人，疯了

英国前首相回忆录中的黛安娜

M 悦 读 K

第二十五卷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25

M 悦读 K

第二十五卷

主编 / 褚钰泉 一本关于书的书 阅读趣味尽在其中



25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MOOK. 第二十五卷/褚钰泉主编.--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391-7210-1

I. ①悦… II. ①褚…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0839号

悦 读MOOK (第二十五卷)

主 编 褚钰泉
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
特约编辑 林 韵
美术编辑 徐 泓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yuedumook@126.com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30mm×1092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91-7210-1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卷首语

有位作者来访,随手翻阅即将付梓的这卷清样,脱口而出:这一卷可谓是人物的专辑。说的也是,尽管组稿时并非有意为之,但最后选定的稿件,有关人物的内容竟占了很大一部分。

细读起来,所涉及的人物遭遇各不相同,既有对改变人类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也有兢兢业业执教几十年的老教授;有含冤而死的革命者,也有因说了一两句“错话”就身陷囹圄的青年……五花八门,命运各异。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今天看来颇有点不可思议。例如,鲁迅逝世时,曾参与抬棺的青年作家周文,解放后,在一场政治运动中,从革命的领导者一下子成了革命的对象,最终含冤而死,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可由“组织”随意摆布。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摆在面前,令人感慨系之。刊登这类文章,并不仅仅是介绍故事,而是希望引起人们的一点思考: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的?温故而知新,也许能防止此类悲剧的重演。特别对于青年人,了解自己的父辈是从怎样的政治和生活环境中走过来的,不无益处,帮助他们理解生命的价值。

其实,对于刊发有关介绍人物的稿件,我们内心不无顾虑。因为而今无论是专访、口述、自传,或是根据史料写就的作品,编造掺假成分实在太多。有的作者并没掌握多少材料,却以一枝“生花妙笔”,为人涂脂抹粉,吹捧上天;有的通过介绍有关人物,抬高自己,在作品中不惜笔墨描述与某“名人”某“大师”的亲密关系,借以宣扬自己,不少人物早已驾鹤西去,这就叫“死无对证”。而白纸黑字上的宣扬,可为自己今后登上“名家”、“大师”的宝座增添资本。如此作为,既腐蚀文坛,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似应揭而穿之,予以杜绝。

目 录 Contents

人 物	政治运动中的事理与人脉 ——一个领导干部在“运动”中的生死浮沉 朱鸿召 / 005 “福寿绵长”——记吴小如先生 王水照 / 020 无限的怀念、无尽的哀思 ——写在杨宪益逝世两周年之际 邹 霁 / 025 陈寅恪受聘牛津之缘起 沈 迦 / 028
往 事	鸿爪掠影(三)(之五) 王学泰 / 033 “文革”中的小闹剧 陈四益 / 046 “反右”三题 述 毅 / 051
悦读一得	文化一词的复数化 朱正琳 / 058 饶家驹:另一个约翰·拉贝 韩 戍 / 066
议论纷纷	再说鲁迅不想做皇帝 王得后 / 069 走出去主义 王培元 / 073 《二十四孝》:一个低劣的范本 伊 人 / 076
书与插图	顿河岁月 汪家明 / 083
艺苑杂谈	跟随他唱一段《流浪者之歌》 彭小莲 / 090

域外风

信息时代的俊杰

萧文泉 / 094

《说吧,记忆》和纳博科夫的启示

范玮丽 / 100

“性骚扰”在日本缘何屡禁不止?

李兆忠 / 109

挚友笔下的英迪拉·甘地

程荣进 / 112

“老照片”札记

老照片的“价值”

冯克力 / 119

海外书情

美国黑人的政治历程——你还会用手写字吗? ——拯救犹太民族——人兽之间——古本新版——电脑和人脑的结合——深入龙潭访海盗——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寻找伊甸园

/ 125

书海巡游

► 有此一说 ◀

中国人的体质状况令人担忧——中国生活满意度在四十一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专家担忧我国的内生资源和民生保障的不足——中国成为美国海外留学生最大来源国——我国 20% 的高收入家庭消费了近七成的住房——华北平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

/ 133

► 人物志 ◀

隐姓埋名二十八载

冯松 / 136

敢于大胆上书的潘天寿

赵健雄 / 139

章乃器的“右派”帽子

胡治安 / 145

▶ 历史往事 ◀

甄别萧军 修来荣 / 148

女儿的回忆——张治中的最后岁月

张素娥 口述 周海滨 整理 / 152

鉴定彭家木,仅差一滴血 曾鹏宇 / 155

近代中国最早的海归 邢 星 / 158

▶ 图与文 ◀

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薛 秀 / 162

▶ 国情点滴 ◀

国有资产是怎样流失的 海 剑 / 166

中国的有钱人,疯了! 戴舒华 / 171

相关链接 / 中国有多少富人? 袁 野 / 175

相关链接 / 中国大陆究竟有多少贫困人口? 李光敏 / 176

▶ 四面八方 ◀

京城的“鉴定大师” 吴 树 / 180

没有中译本的《丁丁在苏联》 王 晶 / 184

孙中山不是博士 刘继兴 / 187

黛安娜的车祸发生之后 [英]托尼·布莱尔 / 189

中国商人在俄罗斯 刘爱民 / 192

观音是女,是男? 马明博 / 195

毛泽东看电视 张宏杰 / 198

金鱼是如何游上春晚舞台的 傅琰东 闫文亮 / 199

▶ 养生之道 ◀

慈禧太后的养生术 董 佳 / 202

政治运动中的事理与人脉

——一个领导干部在“运动”中的生死浮沉

◎朱鸿召

周文，曾经是深得鲁迅信任的“左联”党团成员，受鲁迅委托购买火腿、香烟等紧缺物品，送到西安，转送长征刚到陕北的中共中央。鲁迅去世，他作为十六位抬棺青年作家之一，参与治丧善后。抗日战争时期，他从成都到延安，先后担任大众读物社社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中央马列学院秘书长身份，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命主持学院“打虎”工作，经多方调查取证，上报材料深得毛泽东重视，批示转发全党参考。殊料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被打成“老虎”者，通过潜在的人脉关系力量，很快组织反击，形势急速逆转，“打虎者”反而转变成被批斗者。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在政治运动中遭遇事理与人脉的矛盾斗争，最后仓惶猝死，并以“自杀”论处，死无葬身之地。时隔二十三年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其家属通过另一种人脉关系资源，促使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并批准给予周文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打虎”报告：集体行动，个人负责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一份由马列学院“打虎队”集体行动，以周文个人署名的《打刘元士“大老虎”的经验》材料，通过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送交中央最高领导。毛泽东极为重视，批示“此经验很好，转发全党参考”。这在马列学院一石激起千重浪，举报的群众拍手欢迎，中直机关党委为该院“三反”运动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而舒了一口气，与刘元士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杨献珍开始筹谋反击。

马列学院是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七月批准成立的高级党校，十一月第一期学员在河北平山县开学。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马列学院随中共中央迁入北平，先住香山慈幼院、碧云寺，后选址西苑自得园。这时，马列学院院长刘少奇、副院长陈伯达都是兼职，不住在学院里，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教育长杨献珍。周文任秘书长，刘元士任副秘书长。

这里所说的“老虎”，是指“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贪污腐败分子。以周文个人名义上交的这份“打虎”报告，是马列学院“打虎队”集体行动的初步经验总结。“这篇东西，是综合了我们打虎队同志们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写成的，还只是初步的稿子，但因中直党委催促赶快拿去付印，所以来不及再交全队同志研究修正，如果其中有不妥当的地方，应由我负责。”^①周文是被中直机关党委指定为该学院“打虎队”负责人，这份经验材料是由该学院党委指定由他综合整理，以他个人名义上交汇报，完全是出于政治责任。这由此后被反攻，他没有推诿任何其他人的事实证明，周文是言行一致，敢于承担责任的。

根据中直机关党委的统一部署，马列学院从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起，至二月十五日，共清查刘元士、沈瑛（该院生产办事处副主任）、于维琛（该院修建科采买员）三人的经济问题，其中以刘元士的情况最为严重，累计金额达二亿三千三百亿元。当时人民币一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一元。依照国家工作人员“勾结私商共同盗窃国家资财，不管本人得钱多少，但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为“大老虎”的标准，刘元士是一只“大老虎”。这份材料就是专门汇报清查刘元士的经济问题。

构成这二亿三千三百万元经济损失的，主要是四笔款项：

其一，刘元士与进驻东北兵工制材厂的私商李德庆联手，“私用马列学院名义要了四十九个车皮”，贩运出一千三百立

方米木材，并替宝隆商行以每立方米一百七十二万元的价格介绍卖给中直机关修建办事处所属光华木厂七百立方米。仅此一项，李德庆按成交价的百分之十给予刘元士报偿。

其二，在这一千三百立方米木材中，刘元士经手为马列学院购买七百立方米，价格为每立方米九十八万八千元，但其中有一百三十立方米报价每立方一百四十万元，冒报五千三百五十六万元。此款当时还虚悬在修建科账上已经半年，据他自己交待，想上腰包，但碍于沈瑛、于维琛等几个都知道此款。

其三，刘元士挪用马列学院修建款十二亿元，与私商大鹏汽车修理厂合伙倒卖汽车，“据他自己坦白，大鹏老板给了他五千万”。

其四，刘元士替大鹏汽车修理厂介绍两部汽车，卖给中共中央华北局。据他自己交待，其中一部，他从大鹏汽车修理厂取得二百万元的佣金。

这四项累计金额为二亿二千五百六十六万元，即周文报告中所写的约数二亿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刘元士坦白的其他一些零星的贪污款，总计二亿三千三百万元。

其他一些零星的贪污款，具体是指刘元士自己坦白交待的：一九四九年初马列学院住香山时，“他进城买木板贪污了一千多万元，帮献珍同志做皮袄子贪污了五万元”等项。

这些数字是迄至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以前的，其实，此后仍然有关于刘元士

涉嫌贪污的大量经济数字被揭发出来。

当时曾先后派出调查组八人到天津、十一人在北京城内、四人去东北、三人去上海,还有人去烟台、张家口等地。然后,所有材料分类集中,专人清理。同时,不断接受群众的检举揭发。时至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后,仍然有张履冰汇报振华股票买卖问题,李风五汇报其他问题。

对于调查来的情况,多方核实后,经过刘元士本人承认才被写入材料的。相反,在此过程中被否定的材料,则被舍弃。原先调查组怀疑刘元士在购买绿豆款上有问题,“一经追问,他(刘元士,引者注)不承认,我(周文,引者注)又找着一些当事人进行调查,弄清了没有问题,我就把问题放下了。”^②上报的打虎经验材料里便只字未提此事。

马列学院“打虎队”审讯刘元士的工作,虽经一波三折,但很快他都供认不讳了。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中直机关召开公审大会,“对大贪污分子采取大压大放政策,为以后打虎造成了十分有利的形势”。二月十日,马列学院召开公审大会,但刘元士态度皮里阳秋,他具有一些特殊性:

一、包袱大。他是一九二六年的党员,“资格”很老,曾和伯达、献珍同志一起坐过牢,共过患难,到马列学院以来,他认定献珍同志一直对他很信任,在公审大会以后他还在念叨着。二、政治上很落后。他整年不看党报,长时期不缴纳党费,对政治很不感兴趣。三、有流氓性。他过去作地下



周文 1950年代在北京

工作时和京津一带的流氓关系很多,他自己就很流氓。四、贪污手段相当老辣,有好些事情从表面看来都可以作两种可能的解释。……五、“攻守同盟”。在“三反”中和他有关的一切内外人犯都没有供出他的问题,有“攻守同盟”是肯定的。六、应付审讯有经验……现在已经发现的是三部曲:第一部是说自己“马虎”、“无原则”、“无立场”来解释一切问题;第二部是说自己想贪污,但是没有贪污成;第三部是说自己已贪污、受贿,但是钱未到手。^③

面对这样一个斗争对象,学院“三反”工作组采取的对策是“先打下他的包袱,打垮他的架子”,即用“三反”斗争的路线政策“使他完全失去精神上的支持”。然后,再用具体的内查外调材料当面对证,“即用他的只能作贪污解释、不能作任何别的解释的事实去压”。经过二月十三日夜审,他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次日又翻悔。十四日,工作组将审讯沈瑛、于维琛暂时停下来,集中力量,主攻刘元士。第一个突破点就是虚悬在学院修建科账上的五千

四百万元，“这是明摆起(着)的贪污，他是不能不承认的”。几经盘问，“果不出我们所料，他承认了是贪污”。紧接着第二个突破点，是刘元士介绍卖给光华木厂七百立方米木材问题。“他介绍那批木板的买卖时，就在他所领导的生产办事处，他把卖主李德庆和宝隆商行经理吴蕴舫安置在一个房间里，把买主修建办事处的许东处长安置在另一个房间里，卖主买主两头不见面，他就在两个房间跑来跑去，完全变成了跑合”。抓住这样的细节，追问：“你身为马列学院的副秘书长，那样热心给人家当跑合是为了什么？”在这些具体的事实面前，刘元士只得低头认账了。

在此基础上，工作组采取的第三个突破点是向他讲明眼前有“三条道路”，敦促他走坦白立功的道路。二月十五日晚，刘元士“他承认算‘大老虎’”。但心存顾虑的是，“他的困难是拿不出钱来”。工作组再给他“梯子”，解除其顾虑。到二月二十五日，“对刘元士对外调查证实刘的坦白”。次日，学院“打虎队”刘元士小组汇报，“刘态度好，说大事都交代完，就是小事没有说完，要想。买汽车是四月的事，三千万是修建科拨的。十五(即2月15日，引者注)以前吃不得，十五以后很吃得，睡得好”。^④

在审查过程中，工作组讲究“斗争策略”，但没有对刘元士、沈瑛、于维琛等人动用“逼供信”，或其他任何体罚措施。对此，周文在当时和稍后都是坦然的。“至于我们是否是逼供信，其程度如何，我想请党委召开原打虎队会议加以总结。我想这

样可以帮助我更好认识问题，我在这问题上再单独进行检讨。”^⑤

所以，就经济数据层面来说，周文提交的上述经验材料是经过集体内查外调，相互映证，并与其本人交代相吻合的。它与事实本身相比，只会小，不会大。因为上交该材料后，仍然有许多其他的数据被反映出来，但都没有再计入其中了。

这些经济数据得到多方确认后，“刘元士材料，由范若愚组负责写成。”同时沈瑛、于维琛两人的材料也由专门小组写成。最后，由组织决定这些材料交由周文汇总，并且经过“打虎队”、学院和中直机关党委会等多层宣读，征求意见。后来周文在其检讨中介绍：“党委会的三反总结，是党委分配了几个同志分担了各段的初稿，党委开会分配的那天，我不在家，几个同志写好交党委看后，党委指定由我执笔把它综合起来。”

如此严肃的组织行为，如此认真的内调外查，如此负责的政治态度，如此确凿的经济数据，为什么很快就被全部推翻了呢？甚至连刘元士自己本人已坦白承认的事实都置之不顾？原因很简单，正是因为这份材料的确凿可靠，才有那么大的分量，足以动摇与刘元士有利益关系者的地位，于是，招致政党政治体制中某些利益群体的迅速反击。

受命打虎：政治运动，层层递压

马列学院的“打虎”活动，是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的一个局部反应，也

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的一个典型案例。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与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其政治目的是为了纯洁进城后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革命队伍，打击资本家和工商业者，击退所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腐蚀进攻。其中“三反”运动，主要是在党政机关、各级工会和公营企业，“在公营企业中应该进行‘三反’，在私人企业中则不应该进行‘三反’，而应进行‘五反’”。^⑥“三反”“五反”两个运动同时进行，是要在政体内外开展清洁运动，保证执政后的共产党组织像战争年代那么廉正清明。那么，问题是在一九四九年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里，怎样才能保证执政党的自身纯洁性？群众性政治运动，像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那样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就成了几乎唯一的选择。

一九五一年十月，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正经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考验，国民生活水平还很低。“但另一面，机关中存在着贪污、腐化、浪费现象（多资产阶级影响的），很严重。现在到时候了，须要加以克服。”^⑦十一月一日，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上报关于

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毛泽东将此批转全党，指示“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⑧十一月二十九日，华北局上报中央关于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贪污案，毛泽东当即批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⑨刚刚执政的



1952年，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北京召开的公审贪污犯大会。



1930年代左联时期周文

中国共产党和年轻的人民共和国都绝对不能容忍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决心已定,势在必行。

此间全国各地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不断上报中央,毛泽东亲自批示后大都转发全党各级领导。但中央直属机关却行动迟缓,开展得不平衡,有些深入些,有些不深入,还有些没有动的,“主席认为不满意,应从一号到十号发动起来。发动不起来,一律撤职。如有不干净,

撤职加开除党籍。规定十天一次报告,第一次在二号送报告。”在中直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上,当汇报到交通部领导没有认真抓,张文昂对运动采取抵触的态度时,毛泽东插言:“张宣布撤职,撤职后不给饭吃,党籍问题由本单位讨论。凡与中央三反方针抵触者一律撤职。”会上,毛泽东还说:“现在三反运动,要大张旗鼓,要和镇压反革命一样。整党八条都整了,但还要贪污,现在就要卷起一股风来,整。如果党员是二十万,如有十二万是贪污的,开除十二万。否则,这个党不知道是谁的。”^⑨

在这样的声势力度下,各地各单位都闻风而动,迅速反应。但马列学院由于杨献珍消极等待,周文不闻其事,所以曾受到中直机关党委的批评。一九五二年初,中直机关党委副书记刘华峰代表中直机关党委到学院,指定周文负责学院“三反”“五反”运动,并根据群众举报,点名将副秘书长刘元士作为重点审查的“老虎”对象。

刘元士被点名当作“老虎”对象,首先是因为生活上的特殊化。当时中直机关工作人员,仍然延续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的生活供给制。时任马列学院副秘书长,主管总务、财务等后勤工作的他,“不同吃小灶的领导同志一起吃饭,而是自行开伙。他领一人小灶伙食费,同老婆、孩子、大姨子一起吃,而他的饭菜既丰富又充足。按小灶标准支付给他的伙食费来看,是办不到的。”^⑩于是,“三反”运动刚刚开始,就不断有群众议论揭发“副秘书长生活特殊”,“领导人员中,有贪污的人”。

在工作上,作为副秘书长,平时他直接向教育长杨献珍汇报工作,而不与秘书长周文通气。周文后来检讨说:“在我担任秘书长工作期间,我们之间在工作上是有些意见的,但我们从未发展成很厉害的争论。……但我是曾经怀疑过他有贪污的。因为在工作中曾经有些同志向我反映过,而当时他经常从供给部领了经费不放在学校而放在别处,学校会计股常常叫没有钱用,同时账目又很乱。这也是增加我的怀疑的。”在工作上,副秘书长应当直接向秘书长负责,但刘元士却不是这样,无论有什么客观原因,这都是不正常的。这种不正常关系,是因为刘元士与杨献珍曾经一九三〇年代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期间被逮捕同时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后经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报请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总书记洛甫(张闻天)批准,同意他们按照监狱当局的要求办理手续出狱。同时出狱的六十一人中还有徐子文(安子文)、张永璞(薄一波)等。刘元士不在这六十一人之列,但他与杨献珍、安子文等人在草岚子监狱共同度过一段艰难的岁月。

而杨献珍被捕,是因为此前中共顺直省委交通科科长周斌(周仲英)和秘书长徐子文(安子文),以及由组织安排刚从上海到天津的陈伯达(被捕后化名王通),在天津英租界集贤里中共顺直省委招待处被捕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派胡鄂公、杨献珍乘船从上海到天津,“设法通过一

切关系,尽一切可能营救天津被捕的同志出狱”。他们积极活动,四处奔走,始料不及的是,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杨献珍在北平虎坊桥刘少白家中被捕。

这一段极其复杂曲折的革命斗争经历,使得刘元士、杨献珍、陈伯达、安子文、薄一波、刘少奇之间,结下了非同寻常的情谊。

“三反”运动发动之初,中共中央就一再强调要领导带头,层层发动。但主持马列学院日常工作的杨献珍等待观望,其原因无他,就是为了遮掩平时负责后勤工作的刘元士。甚至当刘元士的问题已经不断被群众检举时,他仍然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希望能捂住过关。周文后来被迫检讨中谈到,“我曾经把丁光所写的材料转给献珍同志过,我后来给献珍同志写了一个书面意见,也是包含我对刘怀疑的意见。我那书面上的精神,一方面是希望弄清楚问题,一方面也想保全他的。‘三反’开始时,我突然听说他当董事长的问题献珍不知道,倒卖汽车的问题很严重,也是背着领导做的,以及他匆忙跑去东北的问题等等,也是增加了我的怀疑的。我认为我过去是担任秘书长工作的,我既然对他怀疑,在这样严肃的运动中应该表示我对他的态度。为此,我曾在发言的前一天向献珍同志表示了我要提出此问题的态度。我当时自以为是对党负责的态度。现在仔细想来,这当中也多少搀杂了个人情绪,就是我当时觉得如果我不表示,别人提出来,也要逼我不得不表示。”也许,中直机

关党委多少知道为什么马列学院的“打虎”运动当初开展不起来的原因，所以才点名让周文负责，并指定“打虎”对象。

所以，一方面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递进的授命指示，任务目标；一方面是马列学院的消极对待。到实在不能遮掩，捂不住的时候，就任由周文领导的“打虎队”去活动，杨献珍韬光养晦，寻找机会进行反击。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三反”运动之初，毛泽东就要求，“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

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发动，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中央最高领导者在运动之初就下了如此强大的狠心，可能是等待观望者所料想不到的。

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根据六十六军上报的材料，毛泽东当即批示各大军区领导：“根据六十六军的打虎预算及已取得成绩，你们的打虎预算均须重做。各级军区和各军打虎预算和打虎成绩不及六十六军的，须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此令一出，各地“打虎”目标节节攀升。华东军区“打虎”计划预算比以前增加一倍，“由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增为大虎二千余、中小虎六千余”。^②西南区地方和军队系统截止二月十一日已经捕捉“老虎”一万零二十八只，“第二步计划打虎必成数一万七千只，期成数为二万只，内大老虎至少占十分之一”。高度集中的社会政体，在这种时候就显示出无比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中直机关在一月三十一日前捉“大老虎”五只，“小老虎”七只，成绩不大。到二月六日，“大老虎”十七只，“小老虎”五十四只，共七十一只。计划到二月十五日前捉“老虎”一百六十九只，但随即改变为二百五十只至三百只，其中“大老虎”不少于七十只。在这种上级压指标，下级争指标，像开展劳动竞赛那样开展“三反”政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四日，二月十二日，天既暖，
从今日起一定每天不间断地作简报，
一天就是记或高谈也好，一定要坚持下去。
最近期间的工作：
一、抓紧整理卷子，估计需要整十天。
二、抽时间和六个科委的语文教员谈可以
出今晚工作的具体意见，请示最多处，相称处。
三、要求迅速批准语文工作计划，抓紧在最近
完成语文研究，完成立起来。
四、订出语文学习计划。
五、抽时间准备年论文的写作计划。
上午参加语训会的批判问题，任范鼎青加
何俊自己检讨的草稿。
下午谈苏阿林，别做书生，从历史到现实
认识论的讨论，世界大同的迷信不迷信的讨论。
准备新的语文会议发言稿。
晚上请范鼎青，谈唐君毅的检讨，征求他的意见。
这天吃饭时向范谈过语训会问题，这是范鼎青提
出要谈的。
中午时青年报的人给范送信，范答没有问题，物归原主。

周文日记手迹

治运动，就出现了部分单位的逼供信现象。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二月十六日的中直机关党委会上说：“整个运动成绩是有，比较满意，也还不满意。运动进展都比较健康，但在最短（近）时间，个别单位发生急躁情绪，逼供信，最典型的是车轮战，比较普遍的。特殊的是吊打，脱虎皮，冻。这都是干部打虎队搞的，群众是罚跪，拔证章。”一周后他又说：“有的单位不仅车轮战，冻，还有叫在凳子上几个钟头不准动，打是很普遍的。各单位无论如何不能这样。……三反一紧张，各样事都出来了，发生枪杀，有一地把（用）手枪把三反干部打死自杀，天津一警察拿菜刀杀人，一贪污（犯）拿机枪打汽油库，损失很大，自跳火死。暗杀，放毒，还有写假信的。对反革命要很注意，手枪都要收起来，各单位要注意。可靠的同志有枪不要紧，但人家可以偷你的枪。”由此可见当时斗争一度非常紧张。

到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中直机关实际共捉“老虎”三百一十一只，其中“大老虎”五十八只，“小老虎”二百五十三只。截止三月四日，全国共“打老虎”二十四万只。但是，仅中直机关就有二十二自杀，其中已死六人，未死十六人，另有十四人逃跑。

好在此后就没有再追加任务指标，“三反”运动经过一阵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后，大约到一九五二年三月底开始甄别工作，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日，以周文个人名义上交的马列学院“打老虎”经验材料，就是在如此这般形势下出现的。

值得一提的是，马列学院在运动层层加码的形势下，没有增加“老虎”指标，也没有逼供信。但问题是，刘元士是紧跟杨献珍的人，如果把刘元士真的打成了“大老虎”，那么就意味着杨献珍的工作有问题，马列学院的工作也有问题。这显然是院长刘少奇、副院长陈伯达、教育长杨献珍都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在运动高潮迭起的时候，谁也救不了刘元士，没想到高潮很快就过去，接着还有甄别。抓住这个机会，杨献珍“便向刘少奇、安子文汇报了他个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刘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来重新审查，结果证明刘元士没有贪污行为，遂取消了扣给刘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⑩杨献珍个人的看法，没有通过正常的组织程序，在学院党委会议上或学院“三反”工作领导小组上表达，而是直接通过私人的渠道，向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汇报，并且，很快就得到回应，甚至刘少奇表态，安子文亲自过问。这种高度集中的政党政治权力体系里的个人关系网络，借助个人所拥有的政权地位，可以产生非常强大的威力，于是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组织的调查结论，彻底否定了政治组织的调查事实。

文人角色：走出延安，殒命北京

周文受命负责打虎，上交“打老虎”经

验材料,虽然只是执行指示,完成任务,却因此而不自觉地触动了某一些人的政治利益,并遭到无情的斗争反击。

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杨尚昆在中直机关党委会议上讲话,“总党委决定打虎运动一定要三月半结束,个别机关,马列,个别案子除外。”为什么马列学院的“打老虎”运动要成为一个例外?显然,是周文受命上交的经验材料被毛泽东批转全党后,引起杨献珍的极大不满。他终于等到甄别的机会,找到安子文、刘少奇谈过自己的个人看法后,有比中直机关党委更高层的领导关注马列学院,关注刘元士的命运、杨献珍的浮沉。

三月二十一日,杨尚昆又在中直机关党委会议上宣布,“三反作为运动到三月底整个要结束”。但是,“马列学院四月学员中还要打虎,参差不齐,各单位按情况布置,各单位自己掌握。”马列学院学员当



1950年,北京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时学制一般为一年半,分三个学期。“三反”运动中曾经抽调部分学员帮助中直机关其他部门开展“打老虎”斗争。现在,其他部门的“打老虎”斗争基本全部停止后,他们回到本来情况并不复杂,“老虎”人数并不多的马列学院,还要继续参加“打老虎”运动,只能说此虎非彼虎了。

四月五日,刘少奇到马列学院,作关于“三反”“五反”的动员报告。这个时候这个地点作这个动员报告,其具体内容暂且无法知晓,但其对于杨献珍的支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五月十六日,安子文就马列学院“打老虎”运动提出主导性处理意见:

1. 马列学院过去的工作是正确的,执行中央路线、政策、方针,取得很大成绩,这是基本的,是和少奇、伯达的主持,献珍的主持分不开的。缺点是一助手配得不好。

2. 李守宪的错误是严重的,主要是思想意识问题。以个人利益为重,没有照顾党的利益。李派到马列学院去,应是老老实实在陈、杨领导下做些工作,但却对立起来。下车伊始,就批评起来,找毛病,找岔子,说马列学院没有马列主义,这就是错误的。……李一去就抓住刘元士的问题,刘有毛病,杨在此)问题上有缺点,李就抓住此问题和杨对立。

3. 马列学院的三反问题,